



人权理事会
第四十六届会议
2021年2月22日至3月19日
议程项目5
人权机构和机制

2020年社会论坛报告*

概要

根据人权理事会第41/24号决议，2020年10月8日至9日在日内瓦举行了社会论坛。与会者审议了消除贫困和不平等方面的良好做法、成功故事、经验教训和现有挑战。本报告扼要载录了该论坛的讨论情况、结论和建议。

* 本报告附件未经正式编辑，原文照发。



一. 导言

1. 人权理事会在其第 41/24 号决议中重申，社会论坛是联合国人权机制与包括民间社会和基层组织在内的各利益攸关方进行互动对话的独特平台。¹
2. 2020 年社会论坛于 2020 年 10 月 8 日至 9 日在日内瓦举行。论坛重点讨论消除贫困和不平等现象方面的良好做法、成功故事、经验教训和现有挑战。理事会主席任命阿塞拜疆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瓦奇夫·萨迪科夫和蒙古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伦德格·普日布苏伦为论坛共同主席兼报告员。
3. 在主席兼报告员的指导下编写了工作方案，吸取了极端贫困与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和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的意见。本报告扼要载录了论坛的议事情况、结论和建议。与会者名单载于本报告附件。

二. 社会论坛开幕

4. 萨迪科夫先生回顾说，2000 年至 2009 年举行的社会论坛重点讨论与贫困有关的挑战。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使全球贫困状况自 1998 年以来首次加剧并将 1 亿多人推向极端贫困，因此关于贫困的讨论是适时的。他举例说明了阿塞拜疆将贫困率从 2001 年的 49% 降至 2020 年的 5% 的举措。在疫情背景下，在主席国阿塞拜疆的倡议下，不结盟国家运动成立了一个工作队，以建立一个不结盟运动成员国人道主义和医疗需求数据库，并获得了 135 个联合国会员国的支持，从而召开了应对 COVID-19 大流行的大会特别会议。阿塞拜疆以本国名义向世界卫生组织捐赠了 1,000 万美元，以支持受影响最严重的不结盟运动成员国。
5. 伦德格先生回顾指出，不平等是 2010 年至 2019 年社会论坛的一个基本主题。讨论的问题包括实现发展权的障碍和国家间的不平等，如气候变化和缺乏药品。以前的论坛讨论了国家内部的不平等以及包括老年人、残疾人、儿童、青年和传染病患者在内的重点群体的权利。他分享了蒙古的良好做法，该国的贫困现象随着经济增长而减少。挑战是存在的，因为经济增长主要是由采矿部门驱动的，这一部门不具包容性或不稳定，而且近年来增长放缓。然而，政府决心消除贫困，特别是通过实施到 2024 年将贫困率降低到 20% 的国家计划。国际合作和团结是推进转型发展和建立伙伴关系以消除各级贫困和不平等的关键。
6. 人权理事会主席伊丽莎白·蒂希-菲斯尔伯格称社会论坛是一次重要会议，汇集了会员国、民间社会组织、基层组织、活动人士、学者，尤其是权利持有人本身。贫困和不平等阻碍了社会经济权利的享有，加剧了无法享有其他权利的状况。理事会通过了关于极端贫困、外债、食物权、社会保障和相关问题的决议。2020 年，理事会将消除不平等作为其工作的中心。它通过了一项关于 2019 冠状病毒病大流行对人权的影响的主席声明(A/HRC/PRST/43/1)，并讨论了系统性种族主义问题，在其第一项决议(第 43/1 号决议)中承认基于种族主义的不平等影响

¹ 有关社会论坛的更多详细信息，见 www.ohchr.org/EN/Issues/Poverty/SForum/Pages/SForumIndex.aspx。

所有人权。最近的几项决议提到了贫困问题。主席回顾说，所有人都有责任重建得更好，尽一切可能消除贫困和不平等。

7.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指出，贫困肆虐、普遍不平等和结构性歧视是侵犯人权，也是最大的全球挑战之一。有效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植根于人权原则的措施，以及所有人，特别是受影响最严重的人的合作和参与。由于 COVID-19，可持续发展目标行动十年恰逢自 1998 年以来全球贫困人口首次增加，疫情将 1 亿多人推向极端贫困。受到影响最严重的是处境脆弱和没有社会保障的人，包括穷人、妇女和女童、儿童和青年、老年人、残疾人、非洲人后裔、种族、族裔和宗教少数群体、土著人民、移民和难民。较贫困的国家实现经济和社会权利的能力面临挑战，包括外债、贸易崩溃、汇款减少、资本外逃、货币贬值和国际发展援助有限。重建得更好需要扭转长期存在的贫困和不平等循环，并加强对可持续发展目标和人权的承诺。高级专员呼吁达成一项新的全球协议，以实现更具包容性的全球治理、更好的金融、贸易和投资监管、债务减免、累进税制、促进脆弱国家的生产能力以克服贫困和气候变化相关挑战、发展合作和作为全球公共产品获得 COVID-19 疫苗，同时确保普遍的社会保障，保护人民的发展权，并维护民间社会的关键作用。

三. 会议纪要

A. 主旨发言人

8. 中国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志刚表示，减缓和消除贫困是人权保护的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将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放在首位，致力于以减贫促进人权。2012 年，共产党设定了到 2020 年在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退出、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通过遵循“扶贫先识贫”、“责任落实到人”和“对症下药、靶向治疗”的原则，并着眼于精准脱贫，中国创造了其减贫史上最好成绩。通过收集贫困数据、培训专业技能、支持专业化产业、派遣 290 万名官员开展扶贫工作、接入电子商务平台和完善社会保障网络，贫困人口从 2012 年的 9,899 万人减少到 2019 年的 551 万人。在改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以及完善减贫体系方面取得了进一步的成果。关于 COVID-19 对全球减贫的影响，副部长建议关注妇女、儿童、老年人和残疾人，加强政策对话，促进知识产品开发和信息交流，承认新技术和新媒体的作用，并加强人权理事会在减贫方面的作用。

9. 联合国艾滋病病毒/艾滋病联合规划署执行主任温妮·拜安伊玛分享了从防治艾滋病病毒/艾滋病大流行中吸取的三个经验教训，这些经验教训应为防治 COVID-19 提供指导。首先，保健应当被视为一项人权。为此，卫生系统应以公共提供为基础，以便每个人都有平等和负担得起的机会。全球公司税改革，尤其是遏制非法资金流动的改革，对于征收必要的税收至关重要。卫生技术分配系统应进行改革，以结束对疫苗不适当的知识产权保护。印度借鉴艾滋病病毒方面的经验，推动以较低价格为较贫困的国家生产非专利抗逆病毒药品。印度和南非正在进行的寻求免除知识产权保护的倡议应该得到支持，以使人们能够负担得起 COVID-19 的治疗。第二，保健问题应通过基于人权的方法处理，并植根于人权原则。就艾滋病病毒/艾滋病而言，当包括妇女、移民、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间

性者、吸毒者和性工作者在内的被边缘化和被污名化的人起来倡导他们的权利，呼吁结束污名化、歧视和刑事定罪时，情况才得以发生扭转。必须维护这些群体的权利，以结束 COVID-19 疫情，包括消除结构性歧视，如歧视性刑法。只有通过基于人权的方法，才能为所有人实现公共卫生成果。第三，全球团结必须战胜“疫苗民族主义”，终结将利润置于人民之上的制度。全球解决方案对于抗击疫情至关重要。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疫苗必须首先分发给卫生工作者，其次是弱势群体，然后是所有其他人。

10. 巴黎经济学院世界不平等实验室和世界不平等数据库联合主任兼巴黎政治学院讲师 Lucas Chancel 强调指出，自 COVID-19 疫情爆发以来，世界顶级亿万富翁的财富增加了 25%，达到 20 亿美元。疫情的外部冲击加剧了经济、性别和种族不平等。即使在疫情之前，社会也没有多少弹性，因为 40 年的新自由主义倾向于减少税收和更多的私有化，并助长不平等，使富人和公司受益。一些国家更好地缓解了不平等的增加，这表明公共政策可以提供解决方案。在制定良好的政策时，金融信息的透明度至关重要，各国政府必须更好地调查、披露和监测不平等现象。公共服务投资和预分配政策对于确保贫困家庭获得基本商品和服务至关重要。税收和再分配是为这种投资提供资金的关键，为此，遗产税和全球公司税改革是必要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必须重新设计，以增强韧性。经济体系必须重新嵌入更广泛的目标，以便为全球子孙后代带来正义和利益。

11. 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高级代表费基塔莫埃洛亚·卡托阿·乌托伊卡马努强调，为了应对 COVID-19 的影响，应作为一个整体问题应对气候变化、贫困和不平等，同时铭记共生、团结、尊严和尊重。这一疫情表明，气候变化是一个重要的倍增因素，加剧了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和不平等。已经不可持续的债务状况进一步恶化，因为创收活动已经停止，出现了大量失业，从而减少了政府收入。这些国家很少存在正式的安全网，外国汇款也在下降。封锁措施和气候变化造成了社会混乱，破坏了粮食安全、受教育机会和基本连通性，特别是在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等脆弱国家。鉴于 COVID-19 导致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贫困和不平等加剧，高级代表提出了四项建议。首先，这一疫情不应被用作转移应对气候变化和遵守《巴黎协定》努力的借口。第二，需要对不断升级的债务危机采取长期、可持续的解决方案。第三，国际社会应加大对脆弱国家经济刺激计划的支助。第四，真正有意义、有效和包容的民众参与至关重要。

12. 达利特社会活动人士、2006 年正确生活方式奖获得者 Ruth Manorama 谈到种姓制度的不公正和系统性的针对处于种姓制度底层的达利特妇女的性别暴力。她叙述了基于种姓的性侵犯、剥夺达利特女童受教育机会的做法以及厕所人工掏粪的做法。通过达利特人的活动，一些做法已经有所减少。达利特人的生活条件比其他人的更差，30% 的达利特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对于其他人而言，这一比例为 12%。达利特人的预期寿命比其他人少四年。各国应增加穷人的收入，确保他们获得公共服务，包括水和卫生设施、教育和保健，并为此目的促进税收和财政正义。应通过行动计划促进性别平等。充分就业、最低工资和不稳定工作问题，特别是对达利特妇女而言，应当成为优先事项。各国政府必须采取行动减少不平等，并为此听取达利特妇女的意见并赋予她们权能，以确定新的方法和战略。

13. 在主旨发言人之后，极端贫困与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奥利维耶·德许特介绍了一个模型，展示了不同层面的多种贫困原因及其相互作用。² 几个因素使公共政策无法有效减少贫困，例如对幼儿期的投资不足导致贫困的世代相传、对穷人的歧视和非法资金流动。发展权专家机制主席 Bonny Ibhawoh 向论坛通报说，该机制将在发展权的背景下处理种族主义、贫困和不平等问题。COVID-19 对全世界种族和族裔少数群体尤为严重的影响突出表明，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对实现发展权构成了根本障碍。

14. 欧洲联盟、阿塞拜疆(代表不结盟国家运动)、布基纳法索(代表非洲国家集团)、阿尔及利亚、孟加拉国、古巴、埃及、希腊、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拉克、马来西亚、巴基斯坦、突尼斯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的代表发了言。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日内瓦办事处、国际人权和社会发展协会、教皇约翰二十三世社区协会、印度格莱敏基金会、乌克兰议会人权专员(监察员)、马洛卡国际和联合王国西撒哈拉运动的代表也发了言。

15. 与会者强调，COVID-19 主要影响本已属于脆弱群体的人，加剧了现有的贫困和不平等。他们着重指出了包括南南和三方合作在内的国际团结与合作的重要性以及对人权采取整体办法的重要性。《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有可能无法实现，现在是加强国际合作、取消单方面强制性措施、分享卫生技术、减免债务、确保发展援助、增加投资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时候了。通过社会经济影响评估提供社会保障是拯救需要援助的人的关键，最低基本收入应通过减少军费获得资金。卫生服务绝不是富人的特权，而是所有人的公共物品。获得住房、食物、教育和其他公共服务是打破贫困循环和避免更多人陷入贫困的关键。各国应在国家和国际层面开展适当的税收合作，以缩小使跨国公司能够避税的差距。疫情加剧了对边缘化群体的歧视。少数民族、非洲人后裔、罗姆人、农村社区、生活在占领下的人、移民工人和其他被污名化或被排斥的群体必须被赋予权能，并在公共场所得代表。各国必须采取行动，减少对消除贫困构成主要障碍的失业和不稳定的工作。

B. 社区层面：造成不平等和贫困世代相传的因素以及如何克服这些因素

16. 促进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全球倡议执行主任 Magdalena Sepúlveda Carmona 说，COVID-19 扩大了性别不平等，加剧了妇女和女童的贫困。她提出了造成对妇女尤为严重的影响的因素。首先，大多数一线保健工作者是妇女，在卫生保健响应的最底层，妇女比例过高。其次，监禁措施威胁到妇女的安全，基于性别的家庭暴力有所增加。第三，在零售和旅游等部门，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进展可能会逆转。第四，隔离和公共卫生措施对非正规工作和小企业产生了不利影响，从事这些工作的妇女比例过多。第五，家政工人的工作条件变得更加不稳定。最后，疫情暴露了不公正的社会照护组织形式，加剧了妇女和女童承担的过度的无偿照护和家务负担。然而，疫情也为渐进改革提供了机会：首先，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包括通过对性别问题有效的社会保障措施；第二，通过消除税收措施中的性别偏见和打击逃税，促进税收措施中的性别平等；第三，增加对公共服务的投资，特别是对照护部门的投资。

² 见 www.ohchr.org/SiteCollectionImages/Issues/SForum/2020-social-forum.png。

17. 第四世界扶贫国际运动若瑟·赫恩斯档案和研究中心研究主任 Xavier Godinot 介绍了他所在的组织和牛津大学联合开展的关于机构虐待和社会虐待的研究成果，贫困者直接参与了研究的各个阶段，提供了关于他们的亲身经历的深刻见解。根据贫困的玻利维亚母亲的证词，他解释说，贫困的核心经历有三个方面：丧失权能、身心痛苦以及为生存而斗争和抵抗。丧失权能是由于缺乏体面工作、收入不足和不安全、物质和社会剥夺、贡献得不到承认的以及社会和机构虐待。社会虐待是周围环境强加给穷人的不利待遇和污名，剥夺了他们的尊严和身份。机构虐待是指国家或国际机构通过其作为或不作为，无法对有关人员的需要做出适当反应。穷人往往因其处境而遭到指责，他们的才能和知识遭到忽视。他建议在行动计划中结合社会正义和环境正义，因为穷人对污染、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影响最小，但受到的影响却最大。他还建议改善民事登记，因为穷人往往没有登记，无法受益于社会保障。

18. 粮食第一信息和行动网负责问责和监测的代表 Ana María Suárez Franco 讨论了粮食体系和穷人的食物权。她指出，由于 COVID-19, 6.9 亿人正遭受饥饿，估计还有 1.32 亿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粮食不安全导致其他侵犯人权现象，并破坏和平与安全以及性别平等。在金融机构的协助下，土地集中在农业企业手中，影响了穷人获得粮食和资源的机会，包括由于水的私有化等原因。随着土著人民的迁移，大型农业企业还造成了 11% 的温室气体排放，导致气候变化、污染、环境退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穷人往往只能吃到深加工食品(因为它比健康食品便宜)，并遭受肥胖和其他健康问题的困扰，从而延续贫困循环。维护食物权运动建议，粮食体系的改革应包括保护农民和土著粮食体系，允许小型粮食生产者参与制定政策，促进农业生态，追究损害食物权的企业的责任，实现健康状况的重新分布，并执行《联合国农民和农村地区其他劳动者权利宣言》。她告诫不要采取错误的自上而下的解决方案，并支持具有包容性并考虑到当地社区现实情况的粮食体系结构改革。

19. 苏格兰儿童和青年专员办公室的一名青年顾问 Hope Laing 介绍了青年人的贫困经历。在苏格兰，每四名儿童中就有一名受到贫困影响，而且 COVID-19 加剧了这一状况。她讨论了食物贫困、月经贫困和难以获得数字技术的问题。关于食物贫困，她着重指出了对儿童发展的健康、学业、社会和行为影响。由于疫情期间学校关闭，政府向依赖免费校餐的家庭提供了替代支助，但这种支助不总能惠及所有有需要的家庭，也并不总能满足他们的营养需要。关于月经贫困，每四名女童中就有一名曾因为缺少足够的经期产品而缺课。虽然已经向地方当局提供了 400 万英镑以免费提供这类产品，但公共建筑因 COVID-19 而关闭，使得获得这类产品变得很困难。关于难以获得数字技术，许多学生缺乏技术设备和可靠的连接，家人往往共用一台设备，特别是在偏远地区。向在线教育的转变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她强调需要改善青年获得食品、技术和经期产品的机会。基于人权的方法，包括听取青年的意见，是找到解决办法的关键。

20. 在互动对话期间，古巴和教皇约翰二十三世社区协会、第四世界扶贫国际运动塞内加尔办事处、社会保障研究所、国际人权和社会发展协会和爱国愿景组织的代表发了言。与会者强调了社区让穷人参与决策过程的重要性，这构成了一个正当程序，有助于有效措施的实施。应当从人权角度处理贫困问题，国际社会必须通过团结提供支持，并满足发展和人道主义需要，而不是政治利益。税收和发展援助方面的国际合作至关重要。COVID-19 加剧了性别暴力和其他形式的歧

视。妇女必须享有社会保障。儿童和青少年属于最贫困和最脆弱的群体，他们的意见必须得到重视。

21. 对此，Suárez Franco 女士着重指出，贫困的根源是相互关联的，因此必须从整体上加以处理。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各国应该以坚定的政治意愿履行其人权义务。Sepúlveda Carmona 女士强调了参与决策过程的重要性，呼吁采取果敢的再分配政策，她还强调，必须通过公共服务确保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Laing 女士也认为有必要让当地社区和青年参与决策。

C. 全球—地方相互联系：实现发展权及消除贫困和不平等的障碍

22. 单方面强制性措施对享受人权的不良影响问题特别报告员埃琳娜·窦涵讨论了单方面制裁扩大的问题，这给享受包括发展权在内的许多人权造成了障碍。单方面强制性措施在《联合国宪章》或习惯国际法中没有依据，一些决议谴责这种措施为非法措施，对人权具有不良影响。最近的“部门”制裁做法意味着在没有明确理由的情况下对参与某一特定经济领域的全体人口实施制裁。目标个人有时没有保护其权利的补救机制。她强调，疫情使得单方面制裁和二级制裁的不良影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大，随之而来的是国际供应链被破坏和多边合作遭遇障碍。在受制裁的国家，聚合酶链式反应检测试剂盒、卫生产品和其他医疗设备即将耗尽，这些国家大多被剥夺了使用在线会议平台的机会，对商业和教育产生了不良影响。单方面制裁导致侵犯劳动权利和其他权利，包括健康权、食物权、受教育权和信息权，甚至生命权。没有团结与合作、不落实发展权和撤销单方面强制性措施，国际社会就无法保护人权或，也无法从 COVID-19 危机中恢复。

23. 立即普及组织的非洲政策经理和全球互联网关闭负责人 Berhan Taye 指出，数字鸿沟是消除不平等的障碍。数字鸿沟反映了线下的不平等，将全世界 36 亿人，特别是妇女、农村居民、少数群体和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人排除在外。数字不平等对经济状况和人权具有不利影响，COVID-19 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影响。没有电脑和可靠互联网接入的人在封闭期间无法工作或学习。卫生保健服务及用水和卫生基础设施不足、柏油马路较少的地区也是互联网接入较少的地区。与其他线下基础设施和服务不同，电信服务主要由私人公司提供，这些公司只投资于有利可图的领域。缺乏明智的监管加剧了数字鸿沟。互联网关闭还加剧了数字不平等，带来巨大的社会经济影响，并大规模扰乱教育和经济活动。限制性的政策法规，如社交媒体税和博客注册，迫使穷人支付更多费用才能连接互联网。

24. 南方中心执行主任 Carlos María Correa 着重谈到技术转让对于克服发展障碍的重要性。技术是实现发展权和实现发展的关键，包括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以及创造就业方面。由于各国之间的不对称，技术转让是发展中国家获得技术的重要手段。自 1990 年以来，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研发投资中的份额从 6% 上升到 38%，这一增长主要归功于中国。他列举了发展中国家技术发展的障碍：知识产权的扩张，这些知识产权集中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成员国；技术变革的速度加快；发达国家的公司不愿与潜在的竞争对手分享技术；发达国家的技术民族主义和对技术主权的主张有所增加。他回顾了促进技术转让的规范和政策框架，这些框架尚未实现目标或进行评估为时尚早，如最不发达国家技术库。振兴国际技术转让议程对于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权至关重要。

25. 第三世界网络法律顾问和高级研究员 Sanya Reid Smith 介绍了知识产权和获得药品的情况。她告诫说，首先向发达国家的全体人口分发 COVID-19 疫苗，而不是优先考虑全世界的卫生保健工作者和弱势群体，将意味着全球死亡人数翻一番。药品、疫苗、呼吸机、版权和口罩方面的专利和行业秘密阻碍了控制疫情的措施。《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中有例外，但这些例外不足以或很难用来应对疫情带来的巨大挑战。印度和南非提议免除 COVID-19 的知识产权。然而，发达国家继续谈判包含知识产权保护条款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律师事务所正准备向医疗公司提供咨询意见，以起诉侵犯与 COVID-19 有关的技术专利的政府。她支持在疫情背景下停止新的贸易谈判和消除知识产权障碍的呼吁。

26. 发言结束后，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的一名成员 Rodrigo Uprimny 解释说，经济和社会权利的可诉性是各国的一项规范性义务，加强了权利文化，保证了公共服务的提供不受歧视，有助于在公共政策中优先考虑这些权利，并对消除贫困和不平等十分重要。在互动对话期间，孟加拉国、古巴、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马来西亚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的代表发了言。吸烟与健康行动、国际人权和社会发展协会、世界公民协会、教皇约翰二十三世社区协会、权利、司法和社会研究中心和日内瓦国际模拟联合国的代表发了言。发言者支持谈判一项关于发展权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和实现这一权利的其他措施，包括减少军事和对烟草等行业的支出，将资源用于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减轻发展中国家的债务。与会者谴责单方面强制性措施，指出这种措施损害受影响人口的发展权和自决权，加剧贫困和不平等。他们主张在团结的基础上建立以人为中心的知识产权制度，并主张考虑到最不发达国家的情况，普遍分配 COVID-19 疫苗和其他治疗方法。

27. 对此，窦涵女士呼吁对实施单方面强制性措施的每一步进行评估，并呼吁联合国机构更广泛地参与终止这些措施。Reid Smith 女士详细介绍了世界贸易组织对申请加入的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要求高于对其他成员国的要求的做法。Correa 先生表示支持起草一项关于发展权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他支持 COVID-19 医疗知识产权的限制、豁免和例外，并建议遭到单方面强制性措施影响的国家应更多地依靠南南合作。Taye 女士强调，单方面强制性措施和过度遵守规定限制了互联网的接入和应用，对受影响人口的人权产生了不利影响。她还着重指出了基层组织在促进发展权方面的重要性。

D. 全球一地方相互联系：生产能力、公共预算编制、税收正义和参与

28.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贸易与减贫处处长 Patrick Osakwe 讨论了非洲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生产能力。非洲国家受到 COVID-19 的社会经济影响将尤为严重。由此造成的全球贫困增加预计将有 50% 发生在非洲，而非洲人口仅占全球人口的 14%。发展政策应处理使处境不利群体面临贫困、无法获得体面工作和参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因素。发展生产能力是消除非洲贫困的关键，这将需要增加资本积累以进行投资，使生产和出口结构多样化，采取优先提高生产率的国家产业政策，以及加强和更好地利用现有产业和能力。贸发会议建立了生产能力指数，使各国能够监测和根据基准衡量其经济的生产能力，作为政策制定的指南。贸发会议还发布了一份关于如何采取整体办法建设和利用生产能力的报告。

29. 南非经济公正研究所的经济学家和研究员 Busi Sibeko 强调，在讨论财政和预算公正时，需要打破传统的经济政策思维和决策。经济政策一直侧重有限的财政赤字和最低限度的国家干预，这对实现人权产生了不利影响，因为责任被转移到了私营部门。经济政策和预算决策的假设，如涉及经济人的假设，不包括对不同群体的再分配影响；例如，照护工作的分布和环境影响。因此，经济学中的传统观点不适合促进财政和预算公正。从全球来看，紧缩措施加剧了贫困、不平等、债务和失业，对妇女和边缘化群体造成了尤为严重的影响。发展中国家应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实现公正的复苏，建设生产能力并引起结构转型。她建议各国政府：(a) 针对影响较大的领域进行支出，如针对儿童的支出；(b) 投资于高增长和具有就业乘数影响的部门；(c) 通过向家庭进行现金转移刺激需求；(d) 改善最弱势群体的生计；(e) 增加供应(通过投资于生产能力)并推进结构转型；(f) 消除紧缩措施造成的损害；(g) 减少不平等；(h) 支持环境上进步的激励；(i) 制定新的保护就业的社会契约；(j) 促进债务和财政空间方面的长期经济可持续性。

30. 美国乐施会企业宣传高级顾问 Nicholas Lusiani 强调了财政空间、税收和避免非法资金流动对于消除贫困和不平等的重要性。COVID-19 加剧了男女之间、贫富之间、特权阶层与被遗忘者、工人与大公司之间的不平等。在疫情期间，政府为人民提供经济生命线的行动导致全世界债务达到创纪录水平。这种情况可能为采取具有长期影响的紧缩措施创造借口。在过去十年里，紧缩措施通过基本公共服务预算削减、累退税改革、劳动力市场改革和养老金改革成为了侵蚀人权的根本驱动因素。他呼吁对未来进行重新构想，通过税收来替代紧缩，以促进人权和平等，这将意味着通过国际合作实现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的大幅累进，征收临时 COVID-19 利得税以弥补受影响最严重者的损失，以及征收更有效的财产税。人权规范和原则必须指导配有监测工具的税务规范和机制。现有工具包括《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和《对经济改革进行人权影响评估的指导原则》。

31. GloboNews 评论员、O Globo 专栏作家和巴西广播公司播客 Angu de Grilo 主持人 Flávia Oliveira, 讨论了巴西的歧视、种族主义和参与预算编制问题。疫情造成的毁灭性健康和社会经济危机加剧了巴西的极端不平等。这些不平等现象自殖民时代以来就一直存在，黑人被奴役，父权制持续存在，尽管法律发展了一个多世纪。被社会排斥的人获得水、卫生设施、住房和社交距离设施的机会得不到保障。乔治·弗洛伊德被杀害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重大影响，为打击针对黑人青年的警察暴力行为注入了新的活力。它还增强了要求获得更好的教育、保健和就业机会的权能。社会运动主张更公平地分配预算和财政事务的决策权。为了建立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需要对抗一个由中年白人男性主导的体系。她认为，只有社会的多样性反映在政治和经济权力职位上，包括妇女、青年、非洲人后裔和土著人民担任这些职位时，才有可能实现充分的民主和平等。

32. 在互动对话期间，来自贸发会议、Articulação Negra de Pernambuco 组织、阿萨比谢胡亚拉杜瓦基金会、国际人权和社会发展协会、第四世界扶贫国际运动、孟加拉国改善农村状况委员会、国际人权委员会、马洛卡国际和瑞士土著网络的发言者发了言。与会者强调了使穷人和弱势群体真正参与公共政策的重要性。与会者呼吁透明度和问责制，批评腐败是促成贫困的因素。虽然平等机会和社会保障至关重要，但 COVID-19 加剧了不平等，特别是对包括家政工人在内的妇女而言。南南合作可以成为消除贫困和不平等以及实现发展的工具。分享的良好做法

包括孟加拉国增强妇女权能的“毕业方法”、哥伦比亚的土著做法和中国的包容性发展计划。

33. 最后，Osakwe 先生强调了发展中国家间合作对提高生产能力和相互学习的重要性。最不发达国家可以借鉴中国的产业政策和巴西的农业政策。此外，再分配政策、遭受歧视的群体的参与和累进课税，包括财产税、环境税和资本利得税，可以消除贫困和不平等，推进包容性发展。Sibeko 女士介绍了南非在市、省和国家各级的参与机制方面的良好做法，包括累进课税。与基层组织合作可以让人民发表意见，并通过经济分析增强他们的权能。Lusiani 先生指出，各国在处理非法资金流动方面正在取得进展。然而，国际规则削弱了政府对跨国公司征税的能力。经合组织采取了关于利润转移和税务的举措，但要实现变革，需要在联合国这个更加民主的论坛内进行辩论。Oliveira 女士介绍了基层和国家协会在贫民窟开展的支持最弱势群体的活动。

E. 国家政策和公共政策在应对贫困和不平等方面的作用

34. 古巴公共卫生部国家科学和技术研究主任 Ileana Morales Suárez 着重指出，社会政策需要公平。古巴确保免费和普遍的社会服务是所有人的人权，全民可获得疫苗和药品(大部分是当地生产的)。该国将人权列为优先事项，并将其大部分预算用于卫生保健，特别是预防性和初级保健服务、社会援助和教育。COVID-19 大流行是自然环境退化、南半球人口膨胀、不平等加剧和不可持续的消费行为等长期全球问题造成的。疫情显示了基本保健服务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模式的不足，并强化了对公共和全民保健系统的需要。古巴制定了抗击疫情的国家计划，该计划取得了成功，这主要归功于坚定的政治意愿、部际协调、卫生系统的出色组织、社会参与、对弱势群体的预防性照护以及对疑似病例的彻底隔离。尽管对古巴的非法封锁产生了不利影响，但古巴的健康指标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她呼吁国际团结，古巴的努力就是例证，除其他措施外，古巴已向受影响国家派遣了超过 3,500 名医生。

35. 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社会保障司司长 Shahra Razavi 强调，社会保障制度抑制贫困和不平等，有效应对系统性冲击，她列举了中高收入国家的良好做法。各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之间很不平衡，面临诸多挑战。除其他外，自营职业者、非正规工人和移民工人往往缺少获得社会保障的机会。发展中国家采取的现金转移等许多社会保障措施都是临时性的，没有得到法律的承认，而且严重不足。缺少带薪病假和失业福利是社会保障中常见的差距。建立普遍覆盖和全面的制度，不加歧视地作为一项人权提供社会保障，这需要财政能力、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持续投资以及从各种来源调动资源。国内资源调动必须公正，并以财产税等累进税为基础。国际支持和团结对于在低收入国家调动资源至关重要。当务之急是在人权而不是紧缩的基础上，精简所有相关行为体，特别是国际金融机构的政策框架。

36. 新西兰儿童事务专员 Andrew Becroft 指出，尽管新西兰经济强劲，但儿童贫困现象仍然存在。该国的儿童贫困现象在 1991 年和 1992 年急剧增加，与 65 岁以上者的情况相反，65 岁以上者已经得到了与工资增长挂钩的普遍福利的全面覆盖。自 1991 年以来，共有 10% 至 12% 的儿童仍在物质方面处于明显的不利地位。他介绍了新西兰良好做法的三个例子：通过《儿童减贫法》，责成政府实现减少儿童贫困的目标和指标；福利与工资增长挂钩，使儿童获得与经济增长相称

的利益；实施儿童和青年福利战略。各国应改善对儿童的公共服务，特别是通过提供负担得起和易于获得的适当住房和实物福利，如免费校餐和面向 18 岁以下儿童的免费牙科和医疗保健服务。他们必须加强对生命头一千天的支持，使家庭得到一个良好的开端。国家建设需要各国花钱制定好战略，优先处理儿童贫困问题。

37. 国际工会联合会秘书长 Sharan Burrow 回顾说，甚至在 COVID-19 之前，劳动力市场就面临着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历史上最高水平的种族、收入和性别不平等，气候紧急情况、不公平的贸易规则、不稳定的劳工权利和缺乏社会保障的状况加剧了这种不平等。疫情导致 5 亿人失业，16 亿非正规工人可能陷入贫困，而世界上最富有的人的财富则大大增加。2019 年《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劳动世界的未来百年宣言》已经包含了恢复和复原力的要素，涉及社会合同，其基础是劳动保护最低标准、基本劳动权利和标准，包括最低工资和糊口工资、最长工作时间、面向女工的变革性议程以及与气候和技术相关的公正过渡。建设复原力需要全面的社会保障，包括对自营职业者和非正规工人的收入支持。为了创造就业机会，各国应投资于可持续的基础设施、照护工作和公正过渡。她主张建立一个支持最贫困国家的普遍保护基金，包括来自最富裕国家的直接捐赠、特别提款权、与紧缩政策脱钩的债务减免以及公司所得税下限。

38. 蒙古妇女就业支持联合会主席 Ariunaa Shagdarsuren 和蒙古发展联盟主席 Dolgor Ayush 分享了他们在“改变的机会”项目中获得的经验，该项目旨在提高在垃圾填埋场无法容忍的条件下生活和工作的妇女的收入并改善她们的子女的教育。首先向女性垃圾清洁工提供了信息和培训。在建立信任后，这些组织支持她们向政府当局发表意见并主张自己的权利，促成开设了一些针对该群体的政府服务。为改善工作条件和寻找其他工作机会提供了帮助，并开设了一个中心，为儿童提供教育、儿童保育、心理咨询和社会服务。根据这一经验，两位主席提出了应对垃圾清洁工贫困问题的建议，向她们提供以下服务：移民登记，以便她们能够享受公共服务；用来建造自己房屋的土地；公共服务中的平等，特别是在社会福利方面；和儿童保育中心。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应共同努力，减少不平等，确保世界各地每个人的发展。

39. 适当生活水准权所含适当住房及在此方面不受歧视权问题特别报告员巴拉克里什南·拉贾戈帕尔讨论了 COVID-19 对无家可归者或生活在非正规住区者和住房严重不足者尤为严重的影响。甚至在疫情爆发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公共住房短缺、大规模迫迁和房租上涨、无家可归、获得住房方面的歧视以及负担得起的住房短缺的全球危机，最边缘化的社区受害最深。疫情暴露了新自由主义城市化方法所产生的问题，这种方法导致了非正规性增加，住房不足或过度拥挤。他表示关切的是，疫情期间强迫迁离现象有所增加，往往导致无家可归，他再次呼吁暂停迫迁。疫情期间各国政府的良好做法包括抵押贷款还款延期、增加社会保障付款和暂时禁止迫迁。他敦促各国考虑对住房危机的多个层面采取更持久的解决办法，并使这一疫情成为变革的机会。

40. 在互动对话期间，巴林、巴西、哥伦比亚、古巴、格鲁吉亚、印度、马来西亚、斯里兰卡、乌克兰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的代表发了言。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匈牙利基本权利专员办事处、非洲国际人权文化协会、国际人权和社会发展协会、教皇约翰二十三世社区协会、第四世界扶贫国际运动、Josep Irla 基金会、促进受教育权和教育自由国际组织和世界产前教育协会组织的代表发了

言。与会者强调，减少贫困和不平等的主要责任在于国家，而不是私营部门，应为此开展合作。国家应当领导应对贫困、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的努力，让其他行为者参与进来。促进人的个性全面发展的教育是打破少数群体世代相传的贫困和社会排斥循环的关键。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需要法律保护和社会保障、工作、培训和机会，以使他们能够为收容社区做出贡献。COVID-19 方面的成功事例包括对穷人生活条件的现场监测、为最弱势群体提供现金、保健、住房、食品、水和卫生设施的资金、支持小企业的措施和国家可持续发展计划。建议涵盖的事项包括收集分类数据、全民健康覆盖、种族和性别平等、育儿假平等、普遍基本收入、现金转移、在线信息、通信技术和打击腐败的努力。

41. 最后，Razavi 女士介绍了将家政工人和其他非正规工人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的良好做法。她提到在向自营职业者、家庭雇员和其他没有已知雇主的人提供社会保障方面的挑战和良好做法，例如通过简化的“单一税收”制度。向非正规工人提供保护需要实行强制性登记和保险，以实现交叉补贴，并应透明地提供福利。Becroft 先生着重指出，各国应通过具有公开可衡量目标的计划，在减少儿童贫困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他呼吁根据《2030 年议程》，在全球范围内采取集体行动减少贫困，特别是儿童贫困。

F. 国际层面：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筹资和发展权³

42. 贸发会议全球化和发展战略司司长理查德·科祖尔-赖特指出，COVID-19 暴露了多边体系在支持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弱点，可持续发展目标本质上是一套旨在实现包容和可持续互动的相互关联的公共物品。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需要在有针对性的公共政策和强大的多边体系的支持下大量投资。根据贸发会议《2020 年贸易和发展报告》，由私人融资推动、以大公司为中心、受新自由主义驱动的超全球化世界经济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它加剧了不平等、债务和劳动力不安全，并造成投资不足。多边体系设计于 1945 年，旨在支持强大的公共部门和政策空间，以应对社会和政治挑战，防止紧缩政策。然而，它现在却适得其反：正在限制公共部门和政策空间，促进紧缩。多边体系的深入系统性改革应包括提供流动性的特别提款权、国际机构提供更多无条件优惠融资、加强国际税收制度、建立新的国际债务取消机构和公共信用评级机构，以及类似马歇尔计划的应对疫情带来的社会经济挑战的计划。需要采取大胆的政策，按照《2030 年议程》的宏伟目标，共同规划一条新的道路，从疫情中恢复过来走向一个更具复原力、更平等和更可持续的世界。

43. 国际发展学会常务理事斯特凡诺·普拉托讨论了发展融资在实现发展权方面的作用。他着重指出了充满活力的地方经济在社会和经济转型过程中的潜力。全球价值链更关心的是获取价值，而不是增加价值。它们加剧了发展中国家对商品的依赖，并导致初级部门、工业部门和服务部门之间的关系破裂。极度的非本土化瓦解了当地生产、人口和生态之间的社会契约。降低全球经济对各国经济的影响至关重要。地方粮食系统可以减少不平等为中心制定新的经济议程。宏观货币、贸易和投资框架推动各国在地方经济中建立更多的全球层面。这一进程可能会随着全球治理更加民主化和系统转型而逆转。联合国发展筹资进程使这一系统

³ 与贸发会议合作组织的专题小组。

改革能够在发展中国家充分参与的论坛上得到讨论，为推动税收制度、债务架构和金融化动态的改革提供了一个机会。多边改革需要各国首都和常驻联合国代表更强有力的参与和它们之间更密切的合作。

44. 全球经济治理、金融和发展问题顾问 **Bhumika Muchhala** 警告说，预计发展中国家将在疫情后采取紧缩措施，削弱它们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巴黎协定》目标的能力。债务和经济危机的负担将转移到最弱势群体身上，加剧不平等、排斥、歧视和人权侵犯，特别是对妇女和穷人而言。500 多个组织呼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撤销紧缩措施建议。经验影响分析表明，紧缩加深了贫困，具体表现为卫生和教育投资减少、养老金和社会保障损失、公共部门工资冻结和影响公共部门雇员的裁员、无薪照护工作增加和更大程度的累退消费税，违反了核心最低标准、不倒退原则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逐步实现。各国应放弃紧缩的信念，转而促进执行《发展权利宣言》。她主张将扩张性、反周期的财政政策作为实现复苏、就业和加强公共系统和服务的一种手段。这些措施包括累进课税和社会保障制度，如非正规工人的社会保障。实现财政和再分配正义的其他措施包括特别提款权、联合国主权债务解决方案、联合国税务机构以及重新配置债务可持续性评估以涵盖人权、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气候融资。

45. 国家外债和其他有关国际金融义务对充分享有所有人权尤其是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的影响问题独立专家李月芬强调，COVID-19 和随后的经济衰退逆转了多年来在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取得的进展，特别是在减贫和减少与收入和性别有关的不平等方面。债务削弱了刺激计划实现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能力。疫情减少了各国政府可用于实现权利的收入，同时它们的支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偿债的影响。2019 年，64 个低收入国家的外债偿还支出超过了医疗保健支出。发展中国家分配资源应对危机的能力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债务偿付不应优先于权利的实现，尤其是在这种外部冲击时期。国际社会通过了允许喘息空间、债务冻结以及债务重组或取消的规定。2020 年 5 月，独立专家提出了关于通过特别提款权暂停偿债和扩大流动性的建议，其中许多建议正在实施。在全球合作的基础上改革债务架构，包括债务重组机制，能够及时和公平地处理债务问题。

46. 在发言之后，发展权特别报告员萨阿德·阿勒法拉吉回顾了实现发展权的政治、经济和人口方面的挑战。鉴于差距日益扩大，有必要采取措施支持收入最低群体，汇编分类数据，并将权利持有人置于发展政策进程的中心。孟加拉国和印度代表发了言。非洲国际人权文化协会、教皇约翰二十三世社区协会、哥伦比亚阿巴基金会、马洛卡国际以及非洲通信和促进国际经济合作组织的代表发了言。与会者认为，发展权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各国必须查明最需要帮助的人，支持普遍基本收入，并确保刺激计划惠及穷人，而不是银行或武器贸易。必须应对非洲国家、非洲人后裔和全世界青年面临的挑战。累积的外债破坏了社会福利计划。与会者建议对全球金融结构进行系统性改革，以加强民主化和团结，包括通过技术转让、官方发展援助、缩小数字鸿沟以及在市场准入和毕业进程中支持最不发达国家。

47. 对此，普拉托先生重申，为实现权利和可持续发展，必须进行系统性改革，以实现更具包容性的全球经济治理和地方经济转型，增强各国的权能。科祖尔一赖特先生解释说，从 2008 年后危机中吸取的教训表明，应当避免紧缩、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和压低工资。更好的结果需要有利于就业、有利于工资增长、有利于工业多样化的动力和对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支持。李女士表示支持对债务治理进行

系统性改革。发展中国家担心诉诸债务减免会导致未来获得信贷的渠道受阻。私人债权人不愿意采取减免措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实行配额改革，以更好地反映发展中国家的意见。Muchhala 女士着重指出，发展权意味着发展是一项权利，而不是慈善，并且与国际经济秩序联系在一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表明发展中国家的稳定和为它们提供财政空间以振兴发展型国家从而确保人权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G. 迈向变革：打破贫困和不平等循环并确保问责制的模型

48. 联合国人权事务副高级专员娜达·纳西弗主持了与 2019 年 Martin Ennals 奖获得者 Abdul Aziz Muhamat、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社会政策和发展方案高级研究协调员 Katja Hujo 和极端贫困与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德许特先生的讨论。

49. Muhamat 先生对数百名移民在海上溺水、各国的相互指责以及死者家人和朋友的痛苦感到痛惜。贫困和不平等迫使人们离开自己的国家。贫困意味着生活没有权利，被边缘化或受到歧视。它影响教育和健康，儿童尤其受到伤害。由于无法满足基本需求，父母们面临着要么卖掉孩子，要么把他们送到国外的选择。他分享了他的故事，讲述了不平等和不公正如何将他的国家撕裂，并迫使数百万人冒着危险乘船到其他地方寻求平等。然而，在西方国家不存在平等，因为难民和移民受到虐待和侮辱。COVID-19 为提高对难民和移民面临的挑战的认识提供了一个机会，但政策制定者继续对富人与穷人、健康者与不健康者、有证件与无证件的移民与难民进行区别对待。他描述了巴布亚新几内亚马努斯岛被剥夺尊严的情况，在那里，被拘留者是通过数字而不是名字来识别的，他呼吁永远不要将人视为统计数据，并靠慈善过活。人，包括穷人，应该始终拥有参与决策和寻求解决办法的发言权，其角色和责任应承认他们的才能和能力。

50. Hujo 女士回顾说，教育和卫生是重要的平等因素，而 COVID-19 加剧了不平等。公共政策对于消除贫困和不平等至关重要，经济和社会政策是相互关联的。缩小社会保障方面的差距至关重要。贫困与发展有着内在联系，必须成为国家和国际发展战略的核心。应通过综合方法处理不平等问题，打击不对称的权力以及排他性的经济和社会制度、机构和政策。对于穷人，预算和财政制度应该是进步的，而不是倒退的。经济的设计应该减少权力和财富的集中，建立一个能够保护劳动力市场、创造就业、确保社会保障和提供社会服务的更强有力的国家。关于不平等的数据需要透明，需要更好地理解精英阶层如何影响政策和政治。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的研究表明，政策制定者和企业往往比选民和客户更保守，政治家的决定更多地受到精英的影响，而不是其选民的影响。研究表明，社会运动在建立团体和网络联盟时可能有非常大的影响力。这种运动需要政治制度的捍卫者以及与政党、工会和议会等政治机构和进程相联系才能产生影响。在这些运动和政治进程中，参与争取性别、种族和经济平等斗争的人、国际组织、学术界、思想家和艺术家应成为盟友，以确保取得成功。

51. 德许特先生认为，在过去 30 年里，由于全球化和公共服务私有化，各国变得“去民主化”，并且只有准主权。它们的监管或预算选择往往取决于消除国际债权人的疑虑或创造有利于商业的环境以吸引投资者的需要，这涉及降低税收水平、削减公共支出和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减少贫困和不平等以及维护人权的责任不仅应由国家承担，还应由其他行为者承担，包括国际金融机构、多边开

发银行和跨国公司，它们都对这些问题具有决定性影响。特别报告员开发的贫困问题模型显示了不同级别的贫困的所有综合原因，表明注重后市场解决方案并不能有效消除贫困。消除贫困的努力大多是为了弥补市场因累进课税和社会政策相结合而造成的排斥。这种努力值得称赞，但这种做法导致优先将经济增长作为消除贫困的工具，可是促进增长的措施具有排他性影响。此外，由于减贫政策被视为财富从一个群体转移到另一个群体，这种方法可能得不到中产阶级的支持。他提议将重点放在首先防止贫困的市场前解决方案和选择上，如包容性劳动力市场政策。他强调了贫困和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层面：权力、论述和联盟的问题。将贫困归咎于穷人自身的论述使对穷人的歧视看起来可以接受，导致人们因羞愧或害怕遭到辱骂而不行使自己的权利，并破坏了重新分配政策的政治意愿。他呼吁一种关于贫困问题的新的论述，重视穷人的知识、经验和参与，并将贫困的责任从个人和家庭转移到整个社会。归根结底，贫困是未能创造更具包容性的社会所要付出的代价。

四. 结论和建议

52. 普日布苏伦先生回顾了论坛期间的主要观点。COVID-19 对弱势群体，特别是妇女和女童造成了尤为严重的影响，加剧了原有的贫困和不平等，并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构成威胁。发言者建议承认获得疫苗是一种全球公共产品，广泛分享关于疫苗和治疗的卫生技术、数据和知识，以及加强贸易协定中的灵活性。他们呼吁加强教育、卫生、食品、水和环卫领域的公共服务，以便更好地为未来的冲击做好准备。小组成员强调了累进课税、再分配和打击避税和逃税的重要性。社会保障以及规定劳工权利和最低工资的新的社会契约将为具有韧性的安全网提供支持。他回顾了贫困问题模型，该模型说明了地方、国家和国际各级相互关联的造成贫困的原因，并探讨了打破贫困循环的手段。

53. 萨迪科夫先生回顾了讨论的其他主题，强调 COVID-19 暴露并加剧了现有的挑战。弥合数字鸿沟对于实现数字技术在教育、经济活动和获取信息方面的潜力至关重要，特别是在 COVID-19 疫情背景下。穷人在获得公共服务方面面临许多障碍，包括污名化、歧视以及社会和机构虐待行为。与会者强烈呼吁国际团结，特别是与最脆弱国家休戚与共，以应对这场前所未有的危机。小组成员鼓励生产多样化，加强现有结构并确定其优先次序。与会者讨论了丧失权能；极端贫困；生活质量和价值；缺少住房、保健和教育机会；腐败；世代相传的贫困；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以及通过妇女的参与和加强社会安全网提高生产能力的任务等问题。

54. 经联合主席兼报告员确认，社会论坛提出以下结论和建议。

A. 结论

55. 自 2002 年以来，社会论坛讨论了与消除贫困和不平等有关的各种主题。2020 年论坛在以前论坛的基础上，审议了新的挑战，包括 COVID-19 大流行带来的挑战。

56. 在讨论消除贫困和不平等现象方面的良好做法、成功故事、经验教训和现有挑战时，论坛以极端贫困与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开发的贫困问题模型以及其他利益攸关方的贡献为指导。

57. 正如贫困问题模型和《发展权利宣言》所反映的那样，贫困和不平等源自地方、国家和全球各级多重、复杂和相互关联的原因，包括损害人权和可持续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

58. COVID-19 加剧了贫困和不平等，对穷人、妇女、女童、儿童、青年、老年人、残疾人、非正规工人、种族、族裔和宗教少数群体、非洲人后裔、达利特、农民、土著人民、移民和难民造成了尤为严重的影响。

59. 导致贫困和不平等始终存在的因素包括对穷人和边缘化群体的结构性和系统性歧视。儿童和青年获得食物、教育、保健服务和数字技术的机会不足，导致贫困持续世代相传。照护工作无报酬或价值被低估以及非正规部门中妇女人数过多造成了贫困妇女人数的增加。

60. COVID-19 加剧了各国之间的不平等，使得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其他脆弱国家，包括几个中等收入国家，迫切需要国际合作与团结。

61. 小组成员指出新自由主义政策、结构调整和私有化损害了国家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违反了最低核心标准、对不倒退原则的承诺以及社会经济权利的逐步实现，呼吁扩大政策和财政空间。

62. 国家和其他行为体，包括国际金融机构、多边开发银行和跨国公司，在确保有利的国际环境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因此，他们有义务维护人权，并为减少贫困和不平等做出贡献。

B. 建议

63. 采取紧急和果敢的行动是抗击 COVID-19 大流行及其连锁反应并从中恢复的关键。应对方案和相关政策应旨在建立一个更具复原力、更平等和更可持续的世界，在经济、社会、性别、种族、财政、再分配、气候和环境等所有层面实现公正。

64. 在为今世后代建设更美好、更公平和更绿色的社会时，必须将人权，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以及发展权放在首位，并为新的社会契约提供基础。

65. 消除贫困的努力应通过包括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在内的综合办法解决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应对 COVID-19 的措施应该打击权力不对称和排他性的经济和社会制度、机构和政策。打破传统的政策制定，经济体系必须纳入更广泛的目标，并遵循人权为指导。

66. 各国应确保必要的财政和政策空间，在有针对性的公共政策和强有力的多边体系的支持下，对卫生系统、教育、照护工作、住房、水、环卫、电力、基础设施和数字资源进行投资。

67. 应通过包括特别提款权在内的手段进一步扩大暂停偿债、取消债务和扩大流动性的措施，以使发展中国家获得财政和政策空间，实现人权、可持续发展和气

候目标。国际社会应考虑债务架构的替代方案，包括债务重组机制。应尽可能使私人债权人参与处理债务可持续性问题的努力。

68. 应通过国家主导的经济多样化和促进结构转型的努力来发展生产能力，特别关注生产率高的部门，优化现有能力的利用，并改善当地价值链和经济。

69. 消除贫穷的政策应包括收集数据，以确定最需要援助的人和需要优先考虑的领域，同时始终认识到将这种针对性措施具有不全面覆盖的危险，可能会破坏对普遍计划的更广泛的政治支持。这些政策必须旨在消除歧视、系统性和结构性不平等以及对穷人的社会和机构虐待。

70. 民间社会和社会运动在减贫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应确保贫困和边缘化社区积极、自由和有意义地参与国家和国际减贫政策的制定、执行、监测和评价。

71. COVID-19 预计将进一步加剧儿童贫困，应通过具体计划处理这一问题，包括可衡量的目标和专项资金。各国应考虑将儿童保护福利与工资增长挂钩，以减少贫困的世代相传。

72. 为了建设得更好，各国应促进地方、农民和土著粮食体系和农业生态，使小型粮食生产者能够参与政策制定，并通过土地改革解决土地集中问题。

73. 各国应促进向绿色和体面工作的公正过渡，同时保障劳工权利和标准。它们应提供社会保障最低标准，特别关注没有社会保障的弱势群体，如非正规部门和工作不稳定的工人。

74. 各国应采取基于人权的税收办法，为基本社会服务的公共投资筹集必要的资源。措施可包括累进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临时 COVID-19 利得税和财产税。各国必须采取具体步骤，加强国际合作，遏制跨国公司的非法资金流动和税务舞弊。

75. 多边经济、金融和贸易体系必须民主化，包括扩大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改善金融、贸易和投资方面的监管。鼓励所有利益攸关方更多地参与联合国发展筹资进程，该进程为推进更公平的多边体系提供了一个论坛。

76. 所有利益攸关方必须合作振兴技术转让议程，克服包括知识产权扩张在内的障碍，在农业、工业、服务业和创造就业方面实现发展权和可持续发展，并与最不发达国家技术库合作。

77. 各国应加强南北、南南和三方合作与团结。发达国家应加大努力，实现将国民总收入的 0.7% 用于对发展中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0.15% 至 0.2% 用于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的目标。

78. 各国应确保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 COVID-19 疫苗和治疗的普及。所有利益攸关方应支持放弃与 COVID-19 的预防、遏制和治疗有关的某些《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中规定。

79. 各国应取消或避免实施单方面强制性措施，特别是加剧目标国家贫困和不平等的措施。

80. 国际和区域人权机制应继续为各国处理贫困和不平等问题提供指导。

81. 国际金融机构、多边开发银行和跨国公司应进行人权影响评估，并对侵犯人权行为承担责任。

82. 2021 年社会论坛——将以抗击 COVID-19 大流行为主题，特别侧重国际合作和团结，并从人权角度出发——应考虑到贫困和不平等问题以及以往所有论坛的结论和建议。

Annex

List of participants

States Members of the Human Rights Council

Afghanistan; Bahrain; Bangladesh; Brazil; Burkina Faso; Chile; Germany; India; Indonesia; Mexico; Nepal; Pakistan; Philippines; Qatar; Senegal; Slovakia; Ukraine; Venezuela (Bolivarian Republic of).

States Membe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Albania; Algeria; Armenia; Azerbaijan; Barbados; Belarus; Belgium; Bosnia and Herzegovina; Cabo Verde; China Colombia; Cuba; Djibouti; Egypt; El Salvador; Eswatini; Georgia; Ghana; Greece; Guatemala; Iran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q; Kazakhstan; Malaysia; Mali; Mongolia; Montenegro; Morocco; Myanmar; North Macedonia; Romania; Russian Federation; Sri Lanka; Switzerland; Thailand; Tunisia.

Non-Member States represented by observers

State of Palestine; Holy See.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re (ITC); Joint United Nations Programme on HIV/AIDS (UN-AIDS); 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OHCHR);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Office (UNDCO);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 United Nations Entity for Gender Equality and the Empowerment of Women (UN-WOMEN);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UNHCR); United Nations Office at Geneva (UNOG); 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 (UNRISD); World Food Programme (WFP);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IPO).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Mechanisms

Committee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Expert Mechanism on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Independent Expert on the effects of foreign debt and other related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obligations of States on the full enjoyment of all human rights, particularly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Independent Expert on the situation of human rights in Somalia; Special Rapporteur on extreme poverty and human rights; Special Rapporteur on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Special Rapporteur on the negative impact of the unilateral coercive measures on the enjoyment of human rights.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Council of Europe; European Union; Non-Aligned Movement; Organization of Islamic Cooperation; South Centre; World Bank.

National Human Rights Institutions and Children's Commissioner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s Commissioner Scotland; Children's Commissioner, New Zealand; European Network of National Human Rights Institution; Office of the Commissioner for Fundamental Rights of Hungary; the Ukrainian Parliament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 Ombudsman of Ukraine.

Academic institutions

Centre d'Etudes Diplomatiques et Stratégiques; Centre interfacultaire en droits de l'enfant-Université de Genève; Federal University of Bahia; Franklin University Switzerland; Geneva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d Human Rights; Geneva School of

Diplomacy; Georgian Technical University;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Harvard College; Istanbul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chool; Kinnaird College for Women; Paris School of Economics, Sciences Po; McMaster University;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University of London; Swansea University; Universidade Paulista; University for Peace; University of Canberra; University of Glasgow; University of Manouba; University of Stirling; University of Zurich; Willy Brandt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others

Abibimman Foundation; Access Now; Act For Involvement (AFI); Action Against Hunger; Action of Human Movement (AHM); Action on Smoking and Health; Africa Culture Internationale Human Rights; Action pour le développement du Sahel (ADESA); AFEDESE; African Artists for Development; Agence internationale pour le développement; Alliance Globale contre les Mutilations Génitales Féminines; Alsalam Foundation; Americans for Democracy & Human Rights in Bahrain Inc; Angu de Grilo; Arab Center for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Judiciary and the Legal Profession (ACIJLP); Ariana Municipality, Tunisia; Articulação negra de Pernambuco; Asabe Shehu Yar Adua Foundation; Asociación Internacional de Derechos Humanos y Desarrollo Social; Association canadienne pour le droit et la vérité; Association “Paix” pour la lutte contre la Contrainte et l’injustice; Association for the Human Rights of the Azerbaijani people in Iran (AHRAZ) (Norway);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étudiants en sciences économiques et commerciales (AIESEC)-Milano; Association mauritanienne pour la promo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Association nationale de promotion et de protec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Association nationale des partenaires migrants; Association of World Citizens; Association pour les Victimes Du Monde; Association Projet Démocratique du Kurdistan Iranien (PDKI); Association promotion droits humains; Association Thendral; Associazione Comunità Papa Giovanni XXIII; ATD Fourth World; ATD Senegal; Baha’i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Bir Dünya Çocuk Derneği; Building Resources Across Communities (BRAC); Capoeira4Refugees;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Law; Centre de Formations Etudes et Recherches pour le Développement; Centre Europe-tiers monde (CETIM); Centre for Gender Justice and Women Empowerment; Centre for legal aid assistance and settlement; Centre Independent de Recherches et d’Initiatives pour le Dialogue (CIRID); Centre Zagros pour les Droits de l’Homme; China South Industries Group; Club Ohada Thies (COT); Comissão de Igualdade Racial da Ordem dos Advogados do Brasil/Amazonas (COIR OAB/AM); Confederação Nacional de Agricultores Familiares e Empreendedores Familiares Rurais (CONAFER); Congregation of Our Lady of Charity of the Good Shepherd; Congregations of St. Joseph; Consolata Institute; Consortium for Street Children; Construisons Ensemble Le Monde; Convention pour le bien être social; Coppieters Foundation; Development Pathways; Corporación Centro de Estudios de Derecho, Justicia y Sociedad; Dignity Forum Australia Inc.; Dirigentes de mi Comunidad (DICOMU); En Vero; Fondation d’Auteuil; Fondation des Oeuvres pour la Solidarité et le Bien Etre Social (FOSBES ONG); Fondation des œuvres pour la solidarité et le bien être social; FoodFirst Informations and Action-Network (FIAN) International; Fundació Josep Irla; Fundación Abba Colombia; Fundación Cepaim, Acción Integral con Migrantes; Fundación para la Democracia Internacional; Geneva International Model United Nations (GIMUN); Genève pour les droits de l’homme: formation international; Global Initiative for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GloboNews; Golden Crown Group Canada Inc., Universität Rostock; Green Jobs &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Centre (GJASD International); Graduate Women International (GWI); Grameen Foundation India; Human Rights Commission-City of Tucson – USA; Human Rights Law Centre; IBON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Inc.; Initiative d’opposition contre les discours extrémistes; Initiative for Social and Economic Rights; Institute for Economic Justice; Instituto de Estudos Previdenciários (IEPREV);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IDHES);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Women;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Associations of the Elderly;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Social Workers;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n Ageing;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Minorities (IHRAAM);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Council;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Internship Program; International Movement for Advancement of Education Culture Social & Economic Development (IMAECSED); International Network for the Prevention of Elder Abus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the Right to Education and Freedom of Education (OIDEE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of

Parliamentarian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udents' Association of McGill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Trade Union Confederation (ITUC); International Youth and Student Movement for the United Nations; Just Fair; Labour collective LLC Baykal777; Lawyers' Rights Watch Canada; Legal Resources Centre; Maarij Foundation for Peace and Development; Make Mothers Matter; Maloca Internationale; Medicus Mundi Switzerland; MenschenrechtsVerein für politisch Verfolgte e.V.; MINBYUN-Lawyer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 MJ Law firm; Mongolian Women's Employment Support Federation; Mothers Legacy Project; Musique Universelle Arc en Ciel; National Agency for the Control of AIDS, Nigeria; Noorena Shams foundation; Norwegian Church Aid; Nouvara Arris; O Globo newspaper; Oanda consulting, Nigeria; Ohaha Family Foundation; Organisation Camerounaise de Promotion de la Coopération Économique Internationale (OCAPROCE); Organisation Mondiale des Associations pour l'Éducation Prénatale (OMAEP); Oxfam America; Patriotic Vision Organization in Lebanon; P'la Arte; Prime Solicitors United Kingdom; Promotion du Développement Economique et Social (PDES); Radio CBN; Religious of the Sacred Heart of Mary; Réseau d'engagement et de soutien aux organisations de femmes (RESO-Femmes) International; Réseau Unité pour le Développement de Mauritanie; Roma future; Rural Aid Pakistan; Save the Children International; SchweryCade; Shah Maqem Trust; Sindhuli Plus; Societ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SID); Soka Gakkai International; Sovereign Military Order of the Temple of Jerusalem (OSMTH); Swiss Indigenous Network; Tandem Project; Thalassaemia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Limited (TIF); The Chittagong Hill Tracts (CHT) Foundation Inc.; The Consortium for Street Children; The Tokyo Organising Committee of the Olympic and Paralympic Games; Third World Network (TWN); Union of European Football Associations (UEFA); Ukrainian choice-the Right of the people; Union des nations pour l'enseignement, la science universelle et les droits de l'homme (UNESU); Uramba Colombia; Voie éclairée des enfants démunis (VED); Western Sahara Campaign UK; Women's Rehabilitation Centre (WOREC), Kathmandu, Nepal; Women's World Summit Foundation; World Association for the School as an Instrument of Peace; 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 World Inequality Lab; World Organization of the Scout Movement; World Social Forum on Health and Social Security; World Welfare Association; Youth For Human Rights International; Yunus Sports Hub.
